

读典
国学·一日一语

倡导原典阅读，一日一句，受益终生
专家引读，享受中国式心灵鸡汤

见仁见智

林在勇 著

《论语》 一日一语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仁见智——《论语》一日一语 / 林在勇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10

(读典 国学一日一语)

ISBN 978-7-5339-3160-5

I. ①见… II. ①林… III. ①儒家②论语—通俗
读物 IV. ①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6730号

丛书策划 丁毅 柳明晔

丛书统筹 柳明晔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装帧设计 王芳

封面绘图 单斌

责任出版 朱毅平

见仁见智

——《论语》一日一语

林在勇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38千字

印张 9.875

插页 1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160-5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001	序 一	张岱年
003	序 二	王永兴
005	前 言	
017	发真情而见根本	
049	泛爱众而亲仁义	
079	贵自觉而求诸己	

目
录

103	养器局而贵有恒
151	日精进而学不已
177	辨义利而知进止
193	合仁智而行忠恕
227	存敬畏而不苟且
263	极高明而道中庸
283	孔夫子,不可毁

序

一

张岱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中，孔子被尊奉为万世师表，朝野上下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了对于“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批评。李贽的这一批评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平心而论，孔子之所是固然未必是，孔子之所非未必非，但是孔子之所是亦未必非，孔子之所非亦未必是。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谈到“起码的公共生活规

则”，我认为，孔子所讲的道理，有许多即是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都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必须肯定的。孔子的一些言论，如“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今日看来，仍然不失其宝贵的价值。孔子的许多言论看似平易，而实际上具有深湛的意蕴，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类，所以古人称之为“微言”。孔子的微言大义，是必须深切体会才能理解的。

《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的言行，其中条目的排列，既非按时间的顺序，也非按逻辑的顺序，其所以如此排列，必有其原因，现在已不可详考了。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学说，必须把《论语》中各条目加以分类，重新排比，然后才能理解孔子学说的全面意蕴。

林在勇同志以新的观点将《论语》的各条目重新排列，从而加以新的解释，以切己体认的生动文学语言出之，确实饶有新意，给读者以新的启示。这确实是诠释《论语》的一个新的尝试。在勇同志询问我的意见，于是读后略赘数语，向读者推荐。

序

二

王永兴

华夏民族是世界古老民族仅存者，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民族有优良的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这一文化两千多年不断丰富发展，延续至今，其间虽经过严重摧残，但终因其本身之强大生命力和两千年来众多仁人志士以心血生命卫护之发展之，时至今日仍葆其为民族生存之根基与凝聚力，诚宜弘扬光大之也。

吾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创基者为周、孔，而主要为孔；记述孔子言行之主要古籍为《论语》，但圣言简奥，注释疏证者

对圣言的了解多有不同，其解释多侧重章句，对圣言意蕴之阐释殊为不足。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有言曰：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宋贤朱熹等人即新儒家之创始者，吸收外来学说，发展了以周、孔为根基的儒学，对圣言多有新解，并有系统。在勇此书分圣言为多类，间亦引西方贤哲之见解为参证，对圣言多有新解，且成系统；此即新儒学之传衍也！斯书之出，必将使更多人理解圣言，以圣言为准则立言行事，则吾民族之素质必将大为提高，而民族素质乃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独立、文明之根本也。果如是，我华夏民族既独立又文明，屹立于天壤之间而无愧也。我才疏学浅，读在勇书，至为欣喜，愿与在勇共勉之。

前

言

—

简单说，这是一本体认孔子的书。

要体认孔子，就应当直面真孔子。自开天辟地，上下五千年，孔子只有一个，但他却被后人作了种种各样的描叙，与真的孔子有了不少出入。

孔子的伟大，在其生前即已基本上为当世人所公认；及其死后，他的伟大更具有不可逾越的文化象征意味，他的英名也随之成了附会利用的工具，就连《庄子》中也多处以崇仰的口吻引述“圣人(孔子)”的言论。另如《荀子·宥坐》所记“诛少

正卯”一事，虽然可以考定纯属无稽之谈，但编造这一谎言恐怕也未必是出于恶意而厚诬孔子，而是战国法家之徒抬出孔子来为自己压制思想言论自由找根据，借此封堵儒者“为政，焉用杀”的批评之口。但是，结果则分明是污蔑了孔子，在关于孔子的史料中留下垃圾。

孔子的面貌和思想，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肯定和发挥，也逐渐地被改造，打上了后人的印记。梁任公曾经说过：“孔子浸假(逐渐)而为董仲舒、何休，浸假而为马融、郑玄，浸假而为韩愈、欧阳修，浸假而为程颐、朱熹，浸假而为陆九渊、王守仁，浸假而为顾炎武、戴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述诸氏固然各自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是他们所理解、阐述、想象的孔夫子，和两千多年前那位真实的孔子却有着不可避免的失真。至于海通以来，西学东渐，近人多以西方思想作标尺来给中国传统量身材，这就仿佛张献忠的“七杀碑”，高了要杀矮了也要杀，孔子便被骂杀了。在这样心态下所看到的孔子，难免是个更加委屈的假孔子。

要直面真孔子，须辨析史料，去伪存真。舍《论语》而无别的好办法。

《论语》这部书虽然不是孔子亲作，却是与他有直接接触的高材生亲与闻见并向再传弟子们转述的，当时也已经过印证、考订。《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搜集整理孔子的言论，这项工作大概在孔子去世之后不久便开始了，他晚年的一些得意门生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张等人为此作出了比较大

的贡献，渐次增补编写，成为他们设帐授徒的讲义。我们在《论语》中能看到孔子及门弟子的若干言论，原因也在于此。要之，《论语》在孔子身后一代人时间之内基本成书，较为准确地记录、反映了孔子的言行。

经过四百余年的传承，到了汉朝，《论语》主要有三种版本。《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比今本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21篇(把《尧曰》一分为二，另分出第二篇《子张》)，大体差别不大，经汉安昌侯张禹融合齐鲁，后世近两千年里所读的《论语》文本，和我们今天所见的就没有多少差异了。文本虽同，理解上却各有不同。据统计，关于《论语》的书籍有三千余种，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著作中对于《论语》内容的个别零星的讲说。在众多的注解中影响较大的有：三国时期何晏《论语集解》(保留了汉代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本的宝贵材料)，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体现了宋代新儒家不少真知灼见，有张载、二程等人的阐释)，以及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和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现代如杨树达、钱穆先生的注本也值得参考。另外，如今坊肆间最常见的是各种白话标点翻译本，以中华书局诸子集成丛书杨伯峻译本为代表，大同小异。

古今注译既然已经汗牛充栋，这本书的目标自然就不在于此。当然有时免不了要对先儒时贤的注译有所取舍折中，以己意修订而出之。例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也。”今人如此标点，或先儒如此断句，不仅语法上有问题，意思也很牵强，不能很好安排一个“执”字，读者若见过古注或通行的今译，便不难发现其中含糊言之、一笔带过的缺憾。

又如“草上之风，必偃”，标点也有问题，尽管这句话历来的解释都不错，但今人却不免对此标点看不顺眼。其实“草必偃”是这句话的主干，“上之风”（风吹在草上）是状语，应当写成“草，上之风，必偃”，以免理解成“草上的风如何如何”。

另外，注解不确，会导致现代读者对孔夫子的反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句是他要搞愚民政策吗？其实，这里的“可”不是应当、可以、允许的意思，应解作“能够”（有能力做）。用英文表示，不是 may 或者 be allowed to，而是 can 或者 be able to，我们的古汉语是一字兼数义，为什么偏要取歪曲的词义来厚诬孔子呢？他说的“民”也未必就排除了统治阶级，“民”用来代指一般人。孔子是感叹让全体一致地明白仁德非常之难，“不可能”！但却能够推行仁政使大家遵从，从中受益。打个比方，推翻清朝帝制时，许多乡间百姓就为剪辫子而哭得死去活来，要他们一下子明白民主共和的意义就不可能。再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早婚多生现象，要大家马上懂得民族素质的大道理就很难，不如制定政策强化执法，并努力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努力使生活方式现代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推迟婚龄、减少生育数量的趋势），以“使由之（不知不觉就做到了）”。

另一句“唯上智下愚不移”，也仿佛孔子高看统治阶层，贱视下层百姓。其实，孔子前一句话讲“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提升自己。他只是用虚拟语气补充一句：“大概只有那些先天就超常者或弱智者（现代心理学说其占人口比例各为千分之三）无法改变吧。”言下之意：你我大家都既非“上智”，又非“下愚”，都是学而知之的“中人”，那么我们

就都应该“学而时习之”。这哪里是孔夫子看不起“劳动人民”！

误读的危害是使我们远离了孔子的真精神，使我们丧失了体认孔子的机会。

二

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一读孔子，心灵必为之震撼，崇仰之情便油然而生。《论语》中的孔子，朴实无华，冷眼一瞥也许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这正是我们犯了浮躁病。记得曾读过汉代一段“子贡拜师”的寓言性故事。那子贡是才气很高的人，学问、政务都很一流。他的口才在外交上一施展，就使鲁齐吴越晋五国“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巨变，或存或亡，或强或弱；他的机智在生意上一用，就成了富可敌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亿万富翁”。所以，拜师第一年他感觉自己比孔子还更胜一筹，第二年觉得差不多，到第三年才深叹自己望尘莫及。

这故事的真伪且不论，但在《论语》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孔子(仲尼)逝世后，鲁国大夫们在朝中议论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听说后很感慨，他说：“譬之官墙，赐(子贡姓端木，名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又有一次，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非常气愤，驳斥道：“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自有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必

深责；荒唐年代“批孔”的荒唐事，更不必说它。即如吾人今日之尊孔，其中却也隐有许多疑虑，常把孔子作为一件文化古董摆设在那里，不信这尊偶像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还会显什么灵。纵然承认《论语》中有不少具有哲理的言论，却私下以为不通过它，也可从现代各种理论中获得更深刻、广泛的效益。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自己的孔子，虽不必像子贡所骂“人虽欲自绝，何伤于日月”那样严重，但至少是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其“美”、“富”。就譬如《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吧，其中的道理，要今人讲起来，先要翻阅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的西方式教科书若干册，再设横坐标、纵坐标画出遗忘曲线，得出结论说复习很重要；或者搬出哲学著作一大堆，论证理论离不开实践，大谈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又或者到教堂听牧师布道两钟点，终于明白信仰上帝关键是自己日常言行要能“见证”。呜呼，“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何须恁多话！

轻易否定孔子所代表的古老的中国智慧，非常误人。仍以《论语》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以证明我并非专从《论语》中千觅万寻某些章句以作说辞。

有许多人暗地里疑虑孔学思想体系会压抑个人，认为孔学抹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创造性，而且中国两千余年来社会进步的迟缓病根于此。这是让孔子为他根本不必负责的事情负责呢！其实，孔子强调的基点从来就在个人：“我欲仁，斯仁至矣”，“古之学者为己”，“君子求诸己”……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你气养未养、

忧先不先、责有没有，不问自己又问谁呢？孔子开宗明义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是从个人出发的乐观进取精神！

明人张岱《四书遇》有一见解：《论语》首章三句话即是《乾》的内卦，也就是周易六十四卦之首乾卦的第一、第二、第三爻辞。“学而时习之”好比是“终日乾乾”，惕龙也；“有朋自远方来”好比是“见龙在田”，德施普也；“人不知而不愠”好比是“不见是（不被他人肯定）而不闷”，潜龙也。张侗初曰：“世人只认学不真耳！若识得学为何事，便自然悦此际光景。”我们能体味孔子的感受否？北大张岱年教授概括中国文化精神，第一便是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个人和天道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合一的。

三

孔子在封建时代曾被追封为文宣王，清代曲阜孔庙的规模仪仗甚至和皇帝一样规格。但后来连封建帝王也意识到给孔子封个王爵简直是羞辱他，所以宋代以后孔子的头衔是“大成至圣先师”。师道高于君道，道统的圣人高于“陛下圣明”，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道义所在！孔子是万世师表，这不是瞎吹捧。

柳诒征先生说：“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朱熹诗云：“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没有孔子，中华文明如何能似日月光辉，光耀数千年，成为唯一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这不是虚誉。美国出版的《大众年鉴手册》，把孔夫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冠；即使仅论列4位影响世界文明

史的伟人，孔子仍位居榜首。

“打倒孔家店”的冲动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正是回顾寻找孔子真精神的时候。他从来不是个抱残守缺的人，他的气象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恢弘博大。如果谁说孔子学说不合于今日之用，那么凡体悟到孔子真精神者必不以为然。问题最大的大概就是孔子的“礼”了，其实，对于具体的制度，孔子是既看重它，又不看重它。学生宰予嫌三年服丧期时间太长，孔子便问他：“父母去世了，你吃好穿好，心里安宁吗？”宰予硬着嘴说：“安。”孔子说：“既然心安，那你就缩短丧期吧。”孔子考量问题都是从自觉的本心出发，最看重真性情，至于外在的形式只有当它与内在的本质相融合时才是被讲求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子的意向再明显不过了。“克己复礼”、“非礼勿动”之类，只是要求大家为人做事要合乎文明方式，这是我们今天也大力提倡的。

在政治方面，孔子也似乎被看做是保守的。有时孔子还被丑化成很庸鄙的模样，“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被说成是国君一传唤，不等套好车，颠颠地就跑去了。请不要弄错，孔子时代的鲁国国君形同傀儡，鲁昭公被权臣逼得逃亡国外，后来客死他乡；鲁哀公也流亡到越国，追谥用“哀”字就尽在不言中了。孔子敬这样的君，正可见出他的正义感、他的不势利。从个人的修养说，孔子是不想那么多便自然地按照修己敬人的准则去做了，敬君正是发乎敬人爱人的本性。从他的政治理念说，为什么要尊君，因为这样无权的君，想必也无不赦之大罪；君君臣臣讲秩序，比起大夫害君、家臣害大夫、国人相互危害的种种混乱好得多，孔子考虑的出发点还是在“爱人”上。在互

相倾轧的乱世，孔子强调重建秩序，你说他是保守，我说他是具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勇敢抗争的自由意志，又有何不可？！

仁，过去解说“人相偶谓之仁”，也就是说，人和人的关系构成了仁不仁的前提。我以为，孔子的仁学当然要行之于人与人的关系上，但它作为统摄诸德(孝、忠、恕、智、勇、信、恭、宽、敏、惠、中庸)的根本，还是在己不在人，在心不在事的。我有一解，尚未深究详考，我以为“仁”字不应是讲“两个人”，“二”不代表“两个”；“二”就是“上”，甲骨、金文皆有此写法。那么，“人”加“上”，其意为何呢？便是那高于人的东西，人之所以高尚的东西。我觉得按这个思路去想，比较能抓住“仁”的本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确是不假外求的，是个人道德自觉上的事情。人之所以为人的某种性质，存于此灵明的人心之中，谓之“仁”；发露于外，用之于人际，便是种种美德懿行。

孔子的“仁”的精神，最可贵即在于出于自然，不借助外在的宗教律条，即使有一些礼仪节文，那也是出于本心自然的合宜性。所以，孔子的理论其实最不强人所难，最近人情。基督教的“爱人”，要讲到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给他的地步，请他一并左右开弓，这就不近人情，不合事理。道德要求太高，便难落到实处，信奉这种利他主义高标准的人，十有八九一到现实中反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依旧做了俗人。对此，我们当有所了悟。而孔子的仁爱是有原则、有程序的仁爱，是从人伦亲情出发的，由爱父母兄弟开始，进而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一以贯之的结构一致性，毫无弊端。这真正是可久、可远、可大之道！